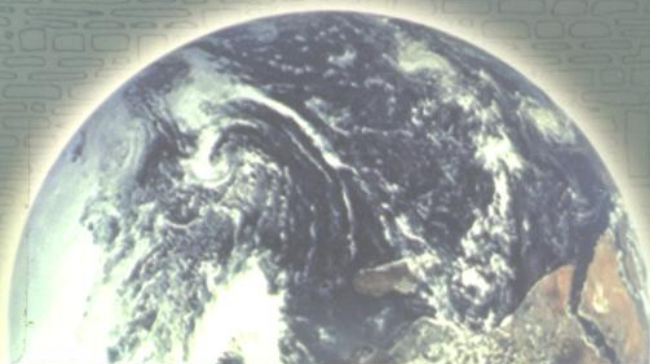


刘靖华 著

霸权

权的兴衰

中国经济出版社



霸权的兴衰

刘靖华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霸权的兴衰/刘靖华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

97.1

ISBN 7-5017-3915-3

I. 霸… II. 刘… III. 霸权主义—研究 IV. D5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323 号

责任编辑:孟庆玲

封面设计:白长江

霸权的兴衰

刘靖华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0.5印张 236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017-3915-3 / F·2811

定价:18.00元

自序

《霸权的兴衰》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最终完成的。但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却不是近一两年来才有的。自从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10年前写了那本轰动一时的《大国的兴衰》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大国兴衰逻辑的探索与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也说明这样一个学术命题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驾驭和论说明白的。古人说：“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想必就是这个道理。无论是长盛不衰也好，还是盛极而衰也好，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那个似乎神秘的兴衰逻辑的暗示。现代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可能使历史上的兴衰逻辑变型乃至走样儿了，但是那个逻辑的根基似乎并未动摇，实际上也无法动摇。生活无非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动态平衡。哲学思辨也好，数理模式也罢，无非就是尽量把这动态平衡关系形式化。经济学家保罗·塞缪尔森说过，经济学中最优美的理论是“比较优势”（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而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认为世界政治中最精致的逻辑是“力量均衡”（The Balance of Power）。仔细想来，这两个看起来是对立的概念其实竟是一回事儿。是不同的观察角度得到的不同的表达形式导致了误解。西方人使用刀叉吃饭，中国人使用筷子吃饭，但是，西方人无法只用刀而不用叉吃饭，中国人也无

法只用一根儿筷子吃饭。无论你是用演绎法得到结论即：对所分析的事实作出前提假设，进而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最后再进行验证；还是通过归纳法产生结论即：首先根据历史材料的分析形成假设，再概括为原则，最后进行验证，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种方式的重合点是“验证”。验证也就是结合。效率就是结合的最优化。

所以说，合作才有效率。但是由于合作各方的起点及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合作产生的效益分配也就不同。合作过程的持续就导致了两种结果：一种是各方均蒙合作之利而皆大欢喜；一种是受益少者因受制于蒙利多者而不断衰微。后者就是合作的成本。现代霸权的兴衰逻辑就包含在合作的进程当中。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重振美国》一书中认为下世纪美国霸业衰微与否端赖其正确的价值观能否得以重振；莱斯特·瑟罗则认为资本主义的前途系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上面。不论怎么说，透过这些战略家的分析，我们似乎感觉到西方人对其霸业和前途的担忧。

有一次，我在美国名校新罕布什尔的 Dartmouth 与那里的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莱昂斯教授讨论亚洲崛起的问题。这位教授的见解我以为是重要的。他说，目前的亚洲是在崛起，但能否就认为世界“中心”已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则是有疑问的，自古称“中心”者，必有某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持久地影响着时代，也就是说它必须提供一种可供遵循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制度两个方面。亚洲不能只顾贸易，不管其他，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的塑造方式是最重要的。莱昂斯教授的观点在美国学术界被称为一种“新认识”，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学者的看法大致相近。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思维与大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传统学术

套式大不一样。对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综合全面地发展,综合全面地塑造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其实,这正是本书所暗含的主题。一个大国,其制造业不能取得内涵式发展,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生产要素扭曲,国际竞争力低下,生产无法进入良性市场循环,长期不能摆脱进口技术与廉价劳动力结合的“派生式增长”,是十分危险和不利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自16世纪以来大国兴衰的一个内在的支配性逻辑。中国的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在吸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也会创造出一个能够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模式。对这一点,人们是有信心的。进入80年代,由于实施了改革战略,中国摆脱了过去灾难性的自我摧残,开始进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经济和社会恢复了增长与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对已明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行了坚定的变革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逐步冲破自我满足的思想文化体系,摆脱了冷战思维,为适应体制转型的文化创新准备了条件。

中国十多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经济增长和实力的增强令许多西方战略家若芒在背,主张“遏制中国”的理论也成为报章杂志的抢手货。现实主义战略家如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主张西方应加速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尽量使中国成为“全球强国”而不是“全球问题”。新现实主义战略家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则看到美国已无万支撑“实力霸权”转而暗示政府注意掌控国际经济秩序的新规则,以控制国际经济的“规则枢纽”,促进合作,重建支配性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而再塑霸权以因应新兴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在21世纪即将来临,我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而国际环境又相对严峻的历史时

期,选择怎样的国际战略,使国家行为与国家利益协调一致,当是关键所在。

在这本书里,我尝试以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视角透视和分析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一以贯之的主线是霸权兴衰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对在西方学术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作出评析。在我国,这些可能还都是新的课题,但是只要开始,就是不晚的。

读者可以从本书中看出,我对全球化前景的看法并非如其他学者那样的乐观。而我对民族国家的强调显然是强烈的。这显得有点儿黑格尔味道。黑格尔认为人类文明史是民族文化的延续,民族国家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民族的本质和精神渗入到国家中去,国家体现着民族的意志和命运。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实际上它没有这样,那并赖不着民族国家。目前西方学者对全球化的论证多半本着两个前提假定:其一是文明是由分而合的,是线性发展的。弗朗西斯·福山就是依据这个假定得出其“历史终结论”的;其二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人类走向一处,合为一体。1996年西方有一本颇有影响力的新著《民族国家的终结》,就是本着这一假定而来的。但是,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难道不是循环的吗?如果将过去人类的分离式生存方式解释成“道术已为天下裂”了,而后则必合,那么“合”了以后的情形又怎样呢?如果合了以后再分,则对民族国家来说,合的成本岂不是太惨重了吗?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保证永远合而不分呢?

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改变不了资源稀缺这一人类的根本困境。资源的有限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类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无限地多;二是市场经济逻辑要求以机会成本配置资源,消耗资源速度快,另外行

业竞争导致了同行业的生产资源稀缺；三是全球资源是以民族国家的合法形式来界定其产权的。中国的资源就是中国的，日本的资源就是日本的，不存在产权不明的问题。正是这一点，既带来了国家间的合作与规则，也带来了冲突与战争，但是合作总是多于战争的。今天的西方和美国战略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明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采取了新战略，那就是：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安排的控制，以其优势的资本和技术，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国界，倡导自由贸易，降低交易成本，进而实现其自由配置全球资源的目标。由此可见，关于世界和人类前景的问题还不像伦理学家说的那样简单。国家主权还是弥足珍贵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策略性的参与”应当是理性的选择。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付出太大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又可避免被西方撒开的“霸权规则”之网套住。美国和西方在未来也是不会轻易和中国“合其道术”的。这也正是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受到前总统尼克松所赞赏的原因。

1996年10月，亨廷顿教授出版了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在书中所表达的“潜在逻辑”就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更不是全世界文化，认为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的观点根本就是西方人的误解，非西方社会一方面寻求现代化，一方面却在抵制西方化，因此，西方必须团结一致，加强实力霸权和文化凝聚力，否则西方就无法再支撑下去。

因此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又是一个对每个国家来说都面临严重挑战的时代。

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三个问题特别令人关注：一是市场

经济的逻辑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它已成为各国政治家治国图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行为工具。由于这个逻辑的扩张,资源的稀缺性空前加剧了,利益与资源竞争骤然激烈了,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也自然就倍受考验;二是西方的市场空前扩大了,西方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得以配置更多的资源进而获取更大的财富,这一事实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其霸权透支的危险;三是全球思想价值的冲突有增强的趋势。因此,我们针对这三个事实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今天的世界有没有新的分界线即利益和实力的分界线?美欧亚三角集团可能成为鼎足之势吗?二、世界秩序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如何交替换位的?三、国际经济关系的民主化将如何实现?这三个问题合起来,就能为我们理解世纪之交的霸权兴衰提供一把钥匙。

我在这本书里试图从理论上探讨这些问题。这一努力当然是初步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讨论在学术界会逐步地深入下去。

1996年12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绪 论

【绪论导读】近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课题。由“霸权的兴衰”所引起的争论正逐渐地深入到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军事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认为,19世纪是英国霸权,20世纪是美国霸权。人们提出的问题是,21世纪是否继续是“美国的世纪”?在美国学术界,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是新现实主义学派,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对美国来说,未来没有经济效率支撑的霸权是难以持久的。在冷战后的“市场时代”,以新的聚集财富的方式支撑霸权的延续,弥补霸权的透支是十分重要的。为此,美国所采取的新战略是以优势的、技术的资本力量,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控制,迫使其他国家或贸易集团降低交易成本进而获得多样化的资源以维持其权力的财富增长以及霸权的支出。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们更乐于将后冷战时代描绘成“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时代。

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与霸权问题

近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成为令人关注的课题。由“霸权的兴衰”引起的争论,逐渐地深入到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军事学等不同领域。学术界一般认为,19世纪是英国霸权,20世纪是美国霸权。因此,美国是否已经衰落以及21世纪能否成为“美国的世纪”,就不是仅凭情绪化的争论所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无论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还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专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对于美国来说,没有经济效率支撑的霸权是难以持久的^①。美国越来越无力维持冷战时代那种成本巨大的军事霸权了。这些学者的共识是在冷战后的“市场时代”,以新的聚集财富的方式支撑其霸权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以优势的技术和资本力量,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控制,迫使其他国家降低交易成本进而获得多样化的资源以维持其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及霸权的支出。从这个意义出发,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专家们更乐于将后冷战时代描绘成“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的时代^②。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复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控制的经济制度形式塑造“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也就是说,①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管理与协调,实现“价格稳定”;②通过世界银行提供微观经济贷款和结构调整贷款以实现“灵活市场”;③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协调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市场交易以实现“贸易自由化”。这种通过制度形式以实现财富和权力持续增长的设想被西方

学术界称为“三位一体的总战略”^③。

例言之，由于反映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美国，它利用多边贸易主义也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另一方面，美国也从未放弃过采取“双边协议”的行为，有时甚至通过单边行动来达到目的^④。其实，不仅欧洲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双边交易，严格控制贸易更是日本的拿手好戏。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确实在大部分时期里保持了市场开放。但是，就连美国的战略家也承认，那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贸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苏联威胁”的外部激励使然，即为了对付“苏联威胁”，美国必须保持市场开放以动员西方内部资源，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进而通过贸易求得繁荣。今天，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毫不讳言它之所以还继续支持多边主义，是为了它自己的商业利益。在后冷战时代，建立一个以“法律与规则”为基础的开放的贸易体系，自然能够使美国聚集财富的成本大大降低。目前在全世界，跨国公司数量最多的是美国且它们的生产多已全球化。美国的目标是，到2000年，争取以出口创造出1,600万个就业机会。可见，美国在商业贸易方面有着重要的利益。为此，美国要求其他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拆除贸易壁垒，减少政府对公司的支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等等，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事情。美国的主流经济学更是对那些不按“比较优势”原理而采取综合发展战略的国家大加抨击，认为这将会使世界陷入“重商主义格局”。

姑且不论美国经济学界在使用大量“专业术语”论述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之后总忘记不了提醒政府“必须保有某种单边能力”，实际上历史地看问题，美国发展到今天也不是遵循比较优势的逻辑。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就认为，正

是美国在二三十年代筑起了贸易壁垒,才“使世界卷入重商主义漩涡^⑤。”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美国,职业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支持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这简直成了从事经济学研究这个行当的一个“入场证”。1996年劳拉·泰森(Laura A. Tyson)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结果这一任命竟在经济学界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许多经济学家反对泰森进入经济顾问委员会,原因竟是她“不相信自由贸易”。

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就那么无懈可击吗?依据这一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也并非在任何时期都能奏效。

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这个理论不断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经典,也常常成为西方的专家学者开给发展中国家求取富强的药方。

简单地讲,所谓比较优势,就是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产业,没有优势的产业就不要发展,哪怕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可以用你的优势产品通过市场交易换来那些你没有优势的产品。举例来说,假定美国和墨西哥在生产产品A和B之间进行选择:如果美国生产2个A的价值相当于一个B,墨西哥生产3个A的价值相当于一个B,那么美国的比较优势是生产B,墨西哥的比较优势是生产A。因为美国生产B所用的成本少于墨西哥生产B的成本。对美国而言,专门生产B在经济学上更有效率。墨西哥则专门生产A更有效率。经过市场交易,美国将一个B投入墨西哥市场就能换得3个A,在美国自己市场上只能换2个A;墨西哥只要将2个A投入美国市场就能换1个B,而在墨西哥自己市场上,则要3个A才能换1个B。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

但是,这一理论要在实践中应用,必须具备几个必不可少

的前提条件：

①必须有一种稳定而和平的国际秩序，换言之，即没有外部性，不存在市场不灵；

②在一国内部，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自由且无成本地流动；

③资本、劳动力技能、信息和技术等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完全利用。

下面我们分析第①个条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无论在国
内，还是在国际上，自由自愿地交换会增加福利。这是一个基
本假定^⑥。也就是说，自由贸易能够体现所有参与国的最佳利
益。为此，经济专门化是有效率的。但是，事实上，即便是在自
由贸易制度之下，一个国家也并不总是直接交换物品。一个国
家内部的个人和企业参与与其他国家的个人和企业的交换关
系，这一简单的事实就提出了在更大的国际市场内“协调不
灵”的可能性问题。

第1，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由于不公正性的严重存在，
“安全困境”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世界市场中严重存在着
不稳定和战争这些“负的外部性”和“世界市场不灵”的问题。
这样的“外部性”就无法使比较优势实现最优化。现代博弈论
表明，一个国家由于担心遭到进攻，所以要有军备。相对水平
的军备又激发了进一步的不安全感，进而导致军备竞争。军备
竞赛及国际秩序的不公正性，使战争、冲突仍时有发生。这说
明我们的时代远远不是康德设想的“永久和平”的时代。外部
性的不可避免使得比较优势逻辑在现实面前需要大打折扣。

第2，关于“调整成本”问题：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经济专
门化就面临着“调整成本”问题，即一旦外部性导致“市场不
灵”，专门化的经济由于贸易受阻而付出巨大的“调整成本”。

这种“调整成本”甚至超过经济专门化所带来的贸易利益。因为贸易利益往往是看得见的、可量化的，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及“调整成本”有时是看不见的，无法量化的，但对于一个国家日后的生存来说甚至是更为根本的。例如科威特，几十年来实行“比较优势”，以“国际市场价格”专门出售石油。但是，一场海湾战争使科威特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科威特虽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打赢”了那场战争，但它毕竟无法在美国的帮助下避免那场战争。海湾战争后，科威特付出的“调整成本”——付给西方人“解放科威特”的费用，重建被毁油井及建筑费用，重整武装和军备的费用等等，其数目到底有多少，恐怕连科威特人自己都不知道。

第3，关于“不交易”问题：安全困境的存在以及国家间的实力竞争，使得各国不能不关心“相对利益”，即在交易时各国不仅考虑双方是否受益的问题，更要考虑谁会受益更多的问题。如果一种交易的预期结果是别国受益更大，那么一个国家可能会拒绝交易。因为它担心受益多的国家会把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实力，以便在下一轮的交易中赢得更大利益。由于博弈常常要经过多个回合才会有结果，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博弈的一方如果将上一轮的一种优势转化为下一轮博弈的另一种优势，则其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博弈的次数是算数级数增长，博弈结果的变化则是几何级数增长。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中，“不交易”现象是极多的。这种不交易现象使比较优势难以发挥，乃至稍微不慎，比较优势就会变成比较劣势。

第4，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法”，规定各国的产权配置都必须遵循同一个模式，所以世界各国的产权配组形式是不同的，但都是合法的。由于各国产权配组形式不相同，导致了政

府与公司和企业的关系也不一样。在有的国家,政府与公司的关系是“互不相干”,政府是政府,公司是公司,这种关系是由这个国家的产权关系所决定的。而在有的国家,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可能是较为密切的。政府为了实现其国家管理目标,可能对公司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政府与公司的不同关系,导致了贸易上的争端。所谓“公平贸易”与“不公平贸易”问题层出不穷。下面我们借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例子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都必须决定是否进入新市场。见下表:

		波音公司	
		进 入	不进入
空中客车公司	进 入	(-10, -10)	(100, 0)
	不进入	(0, 100)	(0, 0)

在这个表中,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公司决定不进入市场,则其收益是零;如果一个公司单独进入市场,则其收益是100。如果两家公司同时进入市场,则双方都付出的“进入成本”为-10。如果波音公司先于空中客车公司进入市场,那么空中客车公司会怎么办呢?如果它也要进,则需付出较大成本。因为波音公司进入市场后会尽量提高对手的“竞争成本”,它可能通过优质服务和安全保险等等一系列方法这样做。如果空中客车公司不进入新市场,则波音公司获得全胜。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如果欧洲政府支持空中客车公司,承诺给予补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假定空中客车公司进入新市场,欧洲政府补贴20。见下表:

		波音公司	
		进 入	不进入
空中客车公司	进 入	(10,10)	(120,0)
	不进入	(0,100)	(0,0)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空中客车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后,不论波音公司做出怎样的反应,空中客车公司都要进入市场,因为它因补贴而有利可图。哪怕它竞争力稍差,它也因为有了政府补贴而降低了进入成本。这时候,波音公司如何选择呢?如果它决定进入新市场,则不仅要付出额外成本,还要与空中客车公司分享市场分额而收益减少,有时其收益会低于边际成本。因此,波音公司会决定不进入新市场。这样空中客车公司大胜,且其收入不是100,而是120。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在这120中,20是政府补贴,其余100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很简单,是从波音公司手里抢来的。欧洲政府对公司的“补贴”使波音公司不得不让出这部分利益。这意味着,欧洲通过政府对公司的补贴使财富从美国转向了欧洲。新古典经济学家会说,政府对公司的“补贴”正是“不公平”竞争的根源。克鲁格曼也承认,公司力量的强弱可能不得不归因于“历史”了。当西方公司进行“殖民地贸易”的时候,殖民地国家的“公司”可能还没有产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政府对公司的补贴和扶助,在日后看来也会是“历史缘由”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日本几十年来就是这么做的),贸易战的发生就成为可能。贸易战的激化可能导致贸易被切断。这样,一个实行比较优势和经济专门化的国家,如果遭到贸易被切断的打击,则不仅要损失贸易收益,更要损失因经济专门化所造成的“调整成本”。此外,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